

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  
—70年代的文化政治

Generation and Epoch / Reality and  
Nativism: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1970s

蕭阿勤 | A-chin Hsiau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朱銘美術館吳順令館長，還有各位來賓，各位美術界的朋友，大家早！

今天早上天氣其實不是很好，前幾天還風和日麗，今天天氣就變很快。這就好像70年代的開端，差不多也是今天早上的這個狀態。接到美術館的邀請，請我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研究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跟各位談70年代，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充滿美術界先進的場合，要怎麼樣跟大家討論。

我想就找出幾個關鍵字來談一談，跟各位分享我對70年代的看法。這幾個關鍵字就是主標題——〈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從這幾個角度，我特別要去講70年代的文化跟政治之間的關聯。

我們這個研討會的主題是「以當代之眼穿越時空」。這是一個充滿了回顧意涵的標題，事實上我們個人跟社會存在的基本狀態，就是不斷地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去回想過去、現在和未來。譬如說時間社會學等的研究，跟心理學一樣，都告訴我們，這是個人或集體生活存在的一個基本狀態。

我們現在有一個流行的字眼叫做「認同」，認同牽涉的是，我們會不斷問自己是誰？我要做什麼？我要往哪裡去？對我最好的利益是什麼？我該怎麼樣掌握生活？我應該怎麼樣生活、過得有意義？所謂的認同，如果從時間的角度去看，大概就是人活在時間中，在不可避免地往前走的過程裡，以回想過去、面對現在、揣想未來的方式，不斷地去回答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我是誰？不過我們知道要用當代之眼穿越時空，意涵已經很明顯了，就是說不可能沒有一個觀點，我們到底要用什麼觀點，從現在去看過去、去想像未來。剛才開幕時吳順令館長特別講到，會舉辦這個研討會的原因，除了回顧過去，事實上是要展望未來。從這點來看，那麼對我們最大

的挑戰，還是在於觀點。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去說70年代的故事？不過我想要跳開一層，除了我們自己怎麼去講70年代的故事之外，今天演講的重點，也在於想去看一看，70年代的他們怎麼講故事。我剛才說，講故事的時候，不管怎麼樣的故事都有觀點，要把故事講好，恐怕最大的挑戰是那個觀點的掌握。我今天就想從「世代」跟「敘事」這兩個觀點，去談一談70年代他們是怎麼講自己的故事。在面對那樣的時代，剛才吳館長其實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簡單的描述，描述70年代大概是怎樣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怎樣面臨新的局勢，怎樣去反思他們自己，說他們自己、還有說整個社會的故事。所謂的「敘事」，在定義上，各位可以暫時將它等同於「故事」。我就從世代和敘事的角度，來簡單討論7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至於美術，我不敢多談，因為我是門外漢。

談世代的時候，我們就會牽涉到少數人跟多數人的問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是在歐洲，而各位很多人應該都讀過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翻一翻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我們可以很清楚瞭解，他談的很多就是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18、20幾歲，大概18到30歲中間的。這個世代的人，第一次面臨這麼恐怖的戰爭，他們經由這個戰爭，重新認識他們上一代向他們灌輸的話，到底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這部小說裡面，有不少對於上一代不言而喻的批判、對上一代看法的幻滅。他們重新認識自己這一代所面臨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樣的命運。有人把這樣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代，叫做「1914的世代」，這在很多世代研究裡，都曾經提到。在文學裡面，我們看到更多這種關於世代的描述，譬如說海明威屬於「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就那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

來說，像海明威這樣的文學菁英，其實是整個世代的人群中的極少數，如果我們畫一個金字塔的話，他們恐怕是那個世代的金字塔頂端，小小的一角。今天的演講，我要談的，正是比較屬於知識分子文化菁英、屬於少數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活躍分子。

不過我們知道，在很多社會中，尤其是快速的、急劇的社會變化裡，往往是少數人影響、決定了好多的事情，他們甚至影響到後來好幾代的人。世代的研究，如果將重點放在文化、藝術或是政治的意識型態上，那麼通常要關注的是少數人，也就是那些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少數人。今天演講要談的，特別是知識階層的年輕世代，也就是我稱為「回歸現實世代」的一群年輕人。在 70 年代的臺灣，他們不斷地問自己是誰，而且不只問我是誰，還問「我們」是誰，問個人也問集體。他們追問我或我們從哪裡來、現在處在什麼狀況、要往何處去。我的討論重點，比較放在跟集體認同有關的那些世代的問題。

簡單的說，關於 70 年代的這樣一個故事，就是這一群年輕人怎麼從一種追求「現代中國」的世界觀，轉變到回歸鄉土現實。從 70 年代在整個臺灣戰後的文化、政治變遷中的位置來看，這是一個從追求現代中國，進而反省、自我批判，轉到回歸像鄉土現實的十年。不過這種轉變，不是每一個人都很整齊，好像下一個口令大家就一起轉變，並不是這樣子的。我要描繪的是十年左右的大致的趨勢。

我們要瞭解 70 年代，還是多少要回顧一下 60 年代。看看 60 年代是什麼樣的時代，才會瞭解我們要討論的那些 70 年代的年輕知識分子如何轉變。我們都很清楚 60 年代是一個以美、蘇為主的冷戰時期。跟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有關的，是 60 年代的兩個重大的特徵，特別是在人口與教育這兩個方面。這兩個特徵在全世界都很像，首先是人口方面，戰後的年輕人口大增。這些戰後的年輕人口，包括 1945 年之後出

生的，也包括 1945 年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剛剛上小學，或者是出生不久的那些年輕人口。美國、蘇聯，乃至包括中國大陸、法國、拉丁美洲等等都一樣，年輕的人口大量增加。跟年輕人口大增同時出現的，是高等教育的擴張。這個時期另外一個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時期，同時也就是現代化思潮高漲的時期。在現代化的思潮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普遍認識到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從傳統社會要變遷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期。當時流行的想法是，要追求好的社會、富足的社會、強大的國家，就要追求現代化。這是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甚至到 80 年代中期，一個橫跨全世界、占有主宰地位的意識型態。

在這個現代化意識形態主宰的時代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專、大學以上的教育，被當做追求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培養下一代成為現代化生力軍的重要工具。但是年輕人口的大增與普設大學、高等教育發達，培養更多的大學生，甚至更多的研究生，這對社會來說，可能也培養了一大批潛在的社會不滿者。一個社會培養了大量的知識分子，會馬上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就業的問題。另外，在 60 年代，流傳了許多批判當時冷戰格局的一些思潮。譬如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的《單向度的人》，批判資本主義下的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商品氾濫對人性與心靈的宰制。另外例如 Daniel Bell 所寫《意識型態的終結》，宣稱冷戰的 50 年代以來的歷史經驗，顯示西方 19 世紀產生的各種意識形態 (尤其是馬克思主義) 對世界的看法，已經站不住腳。綜合來說，在 60 年代廣泛流傳著不滿的思潮，這些東西都在西方的大學校園裡流傳。年輕的知識分子想要尋找新的替代道路，無疑在反抗舊時代跟上一代。這是世界的普遍狀況，包括日本、韓國，大致都一樣。

在60年代的臺灣，我們同樣看到年輕人口大增。年紀跟我相仿的朋友，大概對這種年輕人口大增的情形有點印象。例如我們就讀小學的時候，會看到衛生所會貼出「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標語廣告，這反映了50年代末、60年代以來年輕人口大增下的人口節育政策。臺灣戰後高等教育的擴張也非常快，特別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時廣設大專院校。不過跟世界其他地方相對照，在西方、東亞的日本、韓國等，那種激進的60年代的青年運動與學生運動，在臺灣則看不到。所以當時臺灣許多人在描繪那一代年輕人時，經常稱他們是「沉默的一代」。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樣的「沉默的一代」？那個時代，是國民黨統治加上外省人的生活經驗、思考和世界觀籠罩的時代，這一點無須諱言。外省人的生活經驗、思考跟世界觀，事實上籠罩戰後臺灣幾十年。在臺灣，60年代開始之前，對於這種時代的氣氛、統治的架構、日常生活視野的公開挑戰，大概就來自一些流亡來臺灣的自由主義者。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曾經在1957年的《文星》雜誌發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他說：

這個運動的目標，是要洗刷不適于中國人生存的保守文化，提倡進步的新文化。因此，在政治上要實行民主，在學術上要研究科學。……然而，近七八年來，這個日子居然成了不祥的記號。……這是開倒車的復古主義與現實權力二者互相導演之結果。……除了談主義、喊口號、貼標語以外，又添上讀經，作文言文，寫毛筆字，中醫治癌。花樣繁多，不一而足。

殷先生談的是五四運動，而他所謂「近七八年來」讓五四運動汗名化、抨擊五四運動理念與精神的，就是1950年國民黨改造以來的政治、教育與文化趨勢。殷海光的這段話，簡單扼要地說明當時整個教育、文化、政治的氣氛。

讓我們想像，在這樣的氣氛下，活在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大概是有什麼感覺？當然，人有智愚賢不肖，人們對社會、對自己的敏感度都不一樣。在60年代，一個接受大學以上的教育、書讀得不錯，對公共事務也關懷、心靈也比較敏感的一位年輕人，活在那個時代，大概有什麼樣的感覺？我想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小說家張系國為例。1964年，當時張系國還在臺大唸書。他在校刊裡發表一篇文章〈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後來收到他的書《亞當的肚臍眼》裡（後來又結集為《孔子之死》）。在文章中，他說：

十五年前，大陸淪陷，有三百萬軍民渡海來臺，到現在也維持了一個小康局面。問題是，以後怎麼辦？我從不懷疑，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等大國。目前的情形無疑是一個過渡局面。但可能拖得很久。我們當前的大問題是，在這一時期內我們該採取何種的態度？是這樣醉生夢死下去嗎？還是該勵精圖治，有一番作為？雅典人口不過數萬，在各方面成就卻都極大，為甚麼我們不能？要知道失敗並不可悲。轟轟烈烈的失敗，比苟且偷生好。讓我們面對現實，做一番「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即使失敗了，對歷史也交代得過去。我們生長在臺灣的這一代可說很不幸。既無緣以見江山之美，與過去歷史絕緣，又無辜的要負前人種下的惡果。但如何不怨天、不尤人、不悲觀、不失望的生活下去，在島國上保持天朝之民的胸襟氣度，努力不懈而又能坦然接受失敗，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大問題。

這篇文章發表時的那個時代，是一個國民黨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校園裡面充滿政治監控的時代。一位大學生在校刊裡面寫這個東西，在那個時代其實觸及了很敏感的問題。這個例子顯示，外省籍的這一代年輕人，在60年代成長的一代，如果心靈夠敏感，而且具有批判意識的話，那麼不免有所抱怨，就像張系國一樣。這個埋怨的對象，大部分是針對上一代，質問我們這一代為什麼要背負你們失敗的後果，跑到這個小島、侷限在這個地方，不知道往哪裡去。這種年輕的知識分子，多少具有改革的傾向，但這種人基本上並不多。這些具有改革傾向者，如果還會去關心知識、文化、甚至美術，那麼在那個時代，他們心中關懷的焦點，也可以用兩個關鍵字來綜括，一個是「中國」，另一個就是「現代」。

在那個時代，這些社會的少數者，他們對知識文化的核心關懷，大概都在於追求「中國現代化」。他們關心的，是在現代化思潮籠罩的世界局勢裡，國家要如何現代化而變得富強，因而擺脫目前的困局。但是他們知道，中國不是西方，雖然現代化的理念來自西方，但中國不能完全變成西方。所以他們渴望的，不只要「現代」，而且還要保留「中國」；不只要保留「中國」，而且還是要「現代化」，亦即兩者的結合。從國族意識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現代」與「中國」兩者混雜的、籠統的改革意識。具有這種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像張系國這樣的一代，在他們更早的成長時期，譬如說念高中的時候，尤其在50年代末左右《自由中國》雜誌還沒有被查禁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曾經受到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的影響。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能接受高中的教育已經不容易了，能夠唸大學的更是少數人而已。在那個時代，其中的一些人算是「早慧」，很年輕時就很聰明、很敏感。這些年輕人在高中的時期，恐怕就都已經看過胡適的著作、《自由中國》

之類的東西。

就像張系國一樣，這些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關懷知識文化、甚至有所批判，他們不斷地重新面對百年以來中國國恥的問題，質問：我們為什麼不如人？我們為什麼受辱？我們為何受辱又受苦？進一步來看，這種不如人、受辱、受苦，有兩層意涵。對外省人，特別是對年輕世代來說，自百年前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外國欺凌，這是第一層的苦難；而由於國共內戰，被共產黨打敗，逃亡來臺灣，困居小島，這又經歷了第二層受辱受苦的經驗。這兩層的恥辱，是那個時代許多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不斷面對的焦慮。

前面提到，當時許多具有批判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文化關懷，都集中在結合「中國」跟「現代」這兩者，亦即懷有追求中國現代化的鮮明意識。正因為如此，我們在50年代的後半期到60年代，看到現代詩、現代小說、現代藝術、現代音樂的提倡與發展。在1962年李敖所引起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對峙的兩邊在爭論的，就是對現代化的評價與追求現代化的方式，爭辯的問題諸如：怎麼樣的現代化才是好的？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位置是什麼？傳統的地位與處境如何？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知名的余光中。在60年代，他是臺灣知識文化界一顆閃耀的明星。1963年，他在《文星》雜誌上發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文，其中充滿了既要結合中國、也要結合現代的主張。這個時期許多年輕一代的文藝界（包括詩、小說、藝術、音樂等）人士，都充滿這種意識。

不過，上面所討論的，都是在當時社會上公開可以聽得到、看得到的現象。在整個60年代，事實上還有看不到、被忽略，或頂多登在報紙角落一個小小版面的訊息，那就是類似激進的政治挑戰現象，亦

即像彭明敏等人主張臺灣獨立。1964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印製〈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要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另一個例子，是1966年呂國民、許曹德、顏尹謨、黃華等本省籍年輕知識分子祕密組織「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企圖透過選舉、組織政黨，以「重新建設一個民主國家」，追求臺灣獨立。在國民黨統治加上外省人的生活經驗、思考和世界觀籠罩的時代，這些事件，是大多數人不會知道、不會聽聞的事情，這些事件在成形之前就消失了。

我要再用一個例子，結束對60年代的討論，然後跨到70年代。我們上面所討論，在戰後1945年才開始成長，或是才剛開始出生的一代，歷經了那個時期，接受教育，那麼大概會成長為怎樣的模樣呢？呂秀蓮前副總統在1944年出生，大致就屬於我剛才描述的那樣一個在戰後成長的年輕世代，而她也知識分子。呂副總統在1970年代初從美國回到臺灣，任職於行政院，受國民黨高層所器重。但是她另一方面相當具有社會改革的意識，是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驅。她在工作之餘，積極提倡女性主義，到處去演講，也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專欄。她後來將專欄文章結集成《尋找另一扇窗》一書，在1974年這本書的再版序中，她寫道：

有位朋友說我的話：「剛健中帶著嫵媚俏皮，革命中帶著和平中正」，有位讀者則謂此書「充滿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前者我固愧不敢當，後者則欣然承受。我這樣說，並無意為自己的狂肆放煙幕，乃因我已體認到生為中國人，死必為中國鬼的事實，我於是更加努力於使自己做一個中國人——一個更〔無〕比現代，更〔無〕比邏輯，更〔無〕

比活化的中國人。

……斯時斯地，你我所追尋的，所需要追尋的，不正是一條現代的，邏輯的也活化的中國之路嗎？

呂前副總統寫這段話的時候是30歲。成長在那個時代，像呂前副總統那樣聰明、敏銳、具有改革意識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大致跟她非常相像。我們都知道，呂前副總統後來的政治傾向，有相當大的轉變，但那是後來的事情。這種轉變，與1970年代初的變局密切相關。在1969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要將臺灣東北角釣魚台列嶼，連同琉球，一併歸還給日本。這件事激起了美國的臺灣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運動從美國傳回臺灣，是在1971年四月的春天左右。但是這個保釣運動，沒有幾個月的時間，大致就消失了。但是臺灣馬上又面臨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也就是在聯合國喪失了合法代表中國的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接著臺灣的最主要盟邦、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國，開始跟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簽訂《上海公報》。在《上海公報》中，中共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而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同時美國則在其中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必提出異議。」這個政治變化，對於像呂副總統那樣一位活在那個時代的年輕知識分子，是一個重大的震撼。在此之前，國民黨始終宣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而臺灣當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無庸置疑。

以臺大校園為主的保釣運動，後來激發了學生更多的行動。臺大學生要求校園要有民主，校園的行政要改革，例如要求教官、訓導處等對學生的監控必須改革。在臺灣的保釣運動，以臺大校園為主，但當時像政治大學等，都有類似的學生行動。臺大校園的保釣運動，繼續發展成要求校園改革與民主的學生行動。他們的籲求，甚至超出校園的範圍，進而要求更廣大的社會政治改革跟民主。

從保衛釣魚台運動失敗，到《上海公報》的出現，到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等，這些70年代初的外交挫折，對相當多的年輕知識分子造成重大的衝擊。從史料上來看，當時許多年輕人清楚描述他們面臨這些政治局勢變化時，心裡猶如受到重大的創傷。他們過去所相信的、所認識的東西，好像開始崩垮，他們有一種找不到可以依存的目標的感覺。這些經歷過外在局勢的衝擊、經歷過心理創傷的年輕人，許多也都經歷一種「覺醒」的過程，逐漸認識到土地、人民、鄉土、現實的重要。我的《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這本書，曾詳細討論了當時「年輕的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現象。

關於70年代初臺灣有一個覺醒的戰後世代的社會現象普遍出現，我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位署名「張宏遠」的年輕人，深受這種變局的刺激，在1971年的《大學雜誌》上發表〈說幾句內心的話〉，在文章中，他說：

內政必須立即革新、全面革新，不革新不足以圖存；談到內政問題筆者首先聲明，本人之態度非常保守，觀念非常主觀，自十四歲追隨政府來臺迄今，政府又何異於一己之衣食父母，因此以往儘管有人批評政府，自己從不敢亦不願就此多置一詞。……但是現在之所以談到內政問題，實因內政關係國家之未來太大，關係一般青年之前途太

大，且蒿目時難，深感不立即革新，全面革新，不足以轉危圖存……。

從他的陳述中，各位可以知道，他應該是外省籍的年輕一代。他在14歲時來臺灣，到1971年的時候，大概30幾歲。他的態度很清楚：原來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政府好像是他的父母，從來不加以批評；但是現在實在是忍受不住了，看到時局這麼艱難，無法再沉默。對他而言，從大陸逃難到臺灣，如果國民黨政府再不革新，也許連臺灣也不保，再也無路可逃。這樣一位普通的年輕人，清楚顯示沉重的焦慮感，萌生改革的意識。他代表的是當時眾多的年輕人、許多年輕知識階層成員、文化的菁英等，一種普遍的意識與想法。

70年代有不少的資料，清楚呈現這種年輕知識分子變化的趨勢，顯示他們強烈的世代認同、對上一代的批判、對時局的不滿，以及求新求變的渴望等。其中不少書籍的書名，本身就流露鮮明的世代意識。例如原籍安徽的葉洪生在1972年出版的《這一代的方向》，又例如邱亦彬等人所著的《接棒人》，也在1972年出版，匯集了一些大約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的心聲。上述這兩本書顯示的，是政治意識上比較溫和的言論，沒有激烈的態度。再者，又例如當時剛從臺大畢業的丁庭宇、朱雲漢、章英華、陳百範合著的《蛻變中的新一代》，於1978年出版，表達他們對教育、文化、國運、歷史等的看法，多少比前面提到的兩本著作有更多的社會政治批判意識。進一步來看，又例如同樣是1978年出版的兩本書，宋國誠、黃宗文的《新生代的吶喊》與吳嘉邦的《參與萬歲：為理想而奮鬥的一代》，則表達了更強烈的政治社會批判與改革言論。當時宋國誠、黃宗文都還是大學生，他們充滿熱情，訪問了陳菊、陳婉真、呂秀蓮、陳永興、林正杰、《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等，將這些人當做新生代的代表。這本書的訪談，呈

現他們對於新時代的要求與渴望。吳嘉邦則是當時黨外《這一代》雜誌的總經理。這些例子顯示，70年代確實存在一個充滿了世代意識、批判上一代、要求改革、回歸現實的年輕一代，他們成為一股社會新興的力量。

上面談到，這些年輕知識分子面臨政治變局，都大致經歷了心理創傷與覺醒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具有集體的、普遍的性質。不過具體來說，這種「覺醒」到底是什麼？什麼叫做「覺醒」呢？如果我們看看他們怎麼描述自己如何認識時局，怎麼從以前的自己而有所變化，現在又如何看清楚很多事情，那麼我們會發覺，他們都從一個很長遠的歷史過程開始談起，談論中國是如何、臺灣是什麼、現在喪失釣魚台又到底代表什麼等等。他們談論這個長遠的歷史過程，大概都從19世紀末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談到中國如何被外國強權欺壓、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的歷史。從這個地方，他們開展對於中國、臺灣的過去與現在歷史的看法。

這些覺醒的年輕一代，例如他們在我剛才所舉的那些出版品中的言論，經常都從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的角度來自我定位，也定位他們現在面臨的局勢與事件。他們從一個長遠的歷史架構，去認識自己所處的世代位置是什麼，開始有一個自覺，然後去思考要如何行動。換句話說，當他們有所覺醒，開始去認識他們這一代人到底是什麼、上一代又是如何、他們與上一代的差別何在時，幾乎都憑藉一個「歷史敘事」來表達。他們好像都在講一個很長遠的歷史故事，藉著這個故事來弄清楚自己現在是在什麼情境、反省「我是誰」、「這是什麼時代」等。這些有所覺醒的年輕一代，大致都經歷過這樣的歷程。他們的世代意識浮現，逐漸變得清晰，這都跟一個很清晰的歷史意識的形成密不可分。「世代意識」跟一個更廣大的「歷史意識」，這兩者結

合在一起。我們更看到一個「敘事」跟「認同」結合的情況。也就是說，只有當他們弄清楚自己要擺在一個怎樣的歷史故事裡，才弄清楚自己是誰。有敘事才有認同，有認同才會清楚故事要怎麼講。在這些年輕一代當中普遍出現的覺醒，大體上都呈現出這樣的心靈狀態與過程。

我們可以歸納發現，這樣覺醒的一群年輕世代，在政治上要求的是回歸現實，亦即主張「建國優先」、「民主至上」。所謂建國優先、民主至上，指的是不要去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亦即反攻大陸，而應該將心力投注於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好好建設臺灣，使這個社會更進步，政治更清明、更民主。對這些主張回歸現實的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國民黨來臺後，完全以反攻、懷鄉為主的政治作為是錯誤的。如果在臺灣這個小島上都沒有辦法活下去，被驅逐出聯合國與國際社群，那麼怎麼可能反攻大陸呢？這正是所謂「回歸現實」的核心意義。跟這個政治上的體認相呼應的，是他們也開始認知到，如果政治上要回歸現實，那麼知識文化上，也要開始去認識我們這個社會。他們開始反省：我們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改革應該要從哪個現實點開始才是對的？為什麼過去我們從來沒有把心思放在這塊土地上？他們反省這些問題，開始嘗試改變這個狀況，這正是出於一種基本的想法，就是「回歸鄉土」。

剛才談到，在那個時代，許許多多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要回歸現實，或文化上要回歸鄉土，他們通常基於近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在思考。他們經常倚賴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的故事、從19世紀末的中國開始講起的故事，去思考行動與行動的意義。

我剛才也談到，在一個社會中，對於知識文化敏感、勇於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通常都是少數。如果我們畫一個大圓圈，代表70年代臺



灣整個年輕的戰後世代成員，那麼它其實包括各式各樣背景與身分的人。單純從年齡來看這些年輕一代，他們包括當時可能在美濃種香瓜、或在雲林種西瓜的年輕農人，也涵蓋那些在臺北唸大學的學生，他們通通涵蓋在這個大圈圈裡面。在這個大圈子所包括的年輕一代當中，明顯會受到喪失釣魚台、喪失聯合國席位、《上海公報》、對日斷交，以及後來一系列政治斷交事件等所影響的，恐怕主要是在都市區域受過大專以上的教育、或是正在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那些知識青年。他們是在上述大圓圈裡的一個小圓圈。進一步來看，在這個小圓圈所包括的年輕一代當中，有三群人，相當足以彰顯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政治上要回歸現實、文化上要回歸鄉土的傾向，並且對 80 年代之後政治的與文化的本土化、臺灣化影響重大。

第一群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要回歸鄉土文化，因此開始努力挖掘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第二群則是鄉土文學的作家與提倡者。第三群人，就是黨外的新生代。我們可以說，做為戰後年輕一代，雖然他們大體上都仍然懷有以往所形成的「中國的」與「現代的」結合的國族意識，但他們大致都顯示從追求中國現代化的意識，轉變到回歸鄉土與現實。在理解時局、回歸現實、回歸鄉土時，在探索臺灣過去的歷史文化時，或者是在投入黨外運動時，他們許多人仍然沒有完全擺脫關於中國百年來國恥的敘事，沒有完全揚棄那樣的歷史給自我的定位，但他們已經明顯有所變化。

關於日治時期新文學的挖掘，一個例子是當時擔任《大學雜誌》社長的陳少廷，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大概是那個時候最早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章——〈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在文章中，他認為當時的新文學運動，是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所影響而產生；臺灣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五四前後的文學革

命的一個支流。他也強調，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知識菁英進行文化啟蒙跟抗日運動的一環。對陳少廷來說，它是臺灣抗日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而臺灣抗日的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對照之下，我們知道，80 年代之後在強調本土化或甚至臺灣民族主義的角度下，對於「臺灣文學」是什麼，已經有非常不一樣的闡釋。在 70 年代初，陳少廷等人開始挖掘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時候，仍然將那段文學的發展放在中國歷史敘事中來談論。他們不僅如此定位臺灣的歷史，也如此定位他們自己。又例如另一位挖掘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先驅張良澤，他曾在 1975 年 10 月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一文說道：

只緣愛鄉土的一腔情懷，從早年愛慕祖國五千年文化的覺識，遁入五十年間受日帝統治的臺灣文學，企圖找尋承繼中國新文學的命脈，以告來者：自大陸變色後斷了的「根」，早已深植於臺灣泥土中。

臺灣鄉土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這一支流始自明末志士的慷慨悲歌，中經清人的安撫教化、抗日鬥士的愛國愛種，乃至國民政府遷臺後的詩禮文教，汨汨涓涓，匯為巨河，歷經百世，不可遏止。

……因此，我一生中要研究的對象，便是這些有骨氣的作家：賴和、楊逵、吳濁流、張文環、張深切、呂赫若、鍾理和。

這幾段話，顯示張良澤也非常類似陳少廷。再者，當時也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先驅的林瑞明，也曾在他的《楊逵畫像》一書中說過：

這原是中國人所共同承擔的命運，楊逵作品的更大意義即在於此。他以他所熟悉的背景，寫出中華兒女的哀痛，原不僅僅是狹義的鄉土小說而已。它具有三十年代文學的特質，廣義而言，原本就是中國文學的收穫……

楊逵的精神，已被年輕一代的人繼起。

這股新生的力量。正是未來中國的希望。

在文化上追求回歸鄉土，並且對80年代之後文化本土化影響重大的第二群年輕知識分子，則是鄉土文學的作家與提倡者。陳映真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堅持與宣揚，很多人都非常清楚。王拓在當時也深受保釣運動所刺激。楊青矗也曾有流露中國意識的言論。另外要舉的例子是黃春明，他曾經在1978年的《夏潮》雜誌的〈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文章中說：

把我們的民族，把我們的社會，比喻做一棵神木的軀幹的話，做為一片樹葉子的我們，在枝頭上的時光，我們只有努力經營光合作用，當我飄落地的時辰，我們即是肥料。我們個人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神木的軀幹，即是每一片葉子的努力和盡職。五千年的神木，就意味著有五千梯次的發芽與落葉。我的寫作經驗是徹底的失敗了，我仍然希望成為一個作者，做為神木的一片葉子，和大家一起來為我們的社會，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獻身。

黃春明的這段話，也顯示當時在中國意識、中國現代化思潮下所形塑的世界觀。

雖然談70年代的鄉土文學，限於史料的緣故，我們大都只能夠談

論作家、作者的部分。至於在讀者這方面，我們其實很少有資料可以去瞭解鄉土文學到底是怎樣受歡迎、是誰在歡迎它們、誰在讀它們。我們至多只有間接的資料去論證。例如當時資深而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何欣，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中的〈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一文，曾經討論受鄉土文學影響而盛行的報導文學。他指出這種現象與戰後年輕一代的關連：

一個新讀者群的形成，這個新讀者的主要成員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和踏進中產階級的社會青年，他們完全不同於二十年前的，甚至十年前的讀者了。他們不再被過去的經歷緊緊地束縛著，他們不再有「可憐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覺，抗戰、剿匪這些繫繫於前代人心靈上的經驗，對他們而言，是遙遠的了，是屬於歷史的了。幾年來國際政治的變化使他們對於所謂的那些友邦的依賴也失去信心，這些年輕人不再崇拜以美國文化為內容的文化了，他們回過頭來認識自己，也就是所謂的自我認同。這一種改變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要求，就是認識自己，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文化。這些三十來歲的青年都生於臺灣、長於臺灣，因此他們也最關懷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

何欣所謂一個「新的年輕讀者群」，他們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不會再被過去所束縛，這個「過去」，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國民黨的統治加上外省人的世界觀、生活經驗所籠罩的那種過去。他們不再受限於前一代人的經驗，試著重新認識自己、社會與文化。這些年輕一代，不管本省、外省籍，生於臺灣，三十年來也都長於臺灣，所以他們會喜歡鄉土文學。何欣的這些看法，就是從讀者的角度去觀察，指出一個新的世代的形成。

至於在當時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三群年輕人，就是所謂的「黨外新生代」。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兩群年輕知識分子，主要屬於文學、文化的範圍，在政治方面，我們也同樣看到一個回歸現實世代的出現。這個政治方面的回歸現實世代，對於自己的世代位置，有清晰的自覺，對於自己這個世代必須致力的政治行動，也非常有意識。例如 1977 年張俊宏擔任《這一代雜誌》的總編輯，在創刊號中談到他自己這一代年輕人是「一群焦躁而挫折的新生代」。在 1978 年初的《這一代雜誌》上，一位作者則直言不諱地說道：

自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學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及「打倒俄寇！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如今已四十多歲了。我們從開始上小學到人生旅途的中年。所聽到、看到的、都是同一套呆板的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所引出的非常措施——一戒嚴就是二三十年。沒有一套新的辦法。時代潮流、社會結構急速的變化。我們仍然在抱殘守缺地為幾十年前的失敗餘悸猶存地緊張、發呆。

大陸的丟失，原因何在？誰該負責？那是上一代的事。這些複雜的問題留待歷史家去慢慢檢討、研究。我們目前所應急須努力的該是：在這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如何把握我們目前所能把握的每一方寸土地，遵照 蔣公的遺囑堅守民主陣容、面對現實勵行民主建設，以救亡國（圖）存。

要先能生存，才能談到發展。我們已在惡夢中耽誤了太長的時刻。從前失敗的創痛所造成的不正常心理，嚴重地阻礙我們正常社會建設的進行。

我們可以再用呂秀蓮前副總統為例。她投入黨外陣營，在 1978 年底成為增額國代選舉的黨外候選人時，在她的《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曾經明白地說：「其實『黨外人士』也者，不過一群對政治有興趣，也有其不同見解的非國民黨籍人士，他們希望經由民主和平的方式參與政治，改革現狀」；而「這群人都是在國民黨制式的教育中長大，他們對民主的信念與為民主所作的擔當，正是三十年來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生聚教養的造化」。

接下來，我要談到結論，整理出一個我們理解 70 年代的架構。就臺灣戰後的政治文化變遷來說，70 年代是一個開始明顯變化的時期。在我的《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中，我將這個十年稱做「臺灣戰後文化政治的軸心時期」。每個時代當中，總有一些特定的人群，能夠鼓動、帶領、或者承載某些能夠帶來變化的思想、文化，抑或政治的內容。在 70 年代臺灣的軸心時期，承載那種具有社會變動意涵的思想、文化或政治要素的，就是我所說的這些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所以我將他們稱做「臺灣戰後歷史的軸心世代」。過去的 40 年，正是由這個軸心世代掌握了臺灣大部分的政治與文化的權力，他們是我們許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人物，我在今天的演講中已經提到他們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從 1970 年代到現在，大概有 40 多年了，大概也就是一代人即將步下歷史舞臺的光陰。在 70 年代浮現，逐漸在政治與文化扮演核心角色、掌握權力的回歸現實世代，大致慢慢要從歷史舞臺退下。因此這幾年我們經常聽到，不管是政治或文化上，都出現所謂「世代交替」的聲音。從今天演講的角度來看，要交替的正是這個軸心世代，這個軸心世代快要過去了。

今天的演講，我已經呈現了戰後臺灣從追求中國現代化，如何走到回歸鄉土現實。我也描繪了 1970 年代相當能夠彰顯文化與政治的

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理念，而對後來的本土化、臺灣化影響重大的三群年輕世代的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也就是我剛才指出的挖掘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提倡鄉土文學、與投入黨外的新生代。當然，經歷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之後，臺灣的政治與文化，又是相當不一樣的情況，但從70年代到80年代之後，有變化，也有連續。不過這已經超出我今天演講的範圍了。謝謝各位！

## 1970年代的文學

Literature of the 1970s

陳芳明 | Fang-ming Chen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